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极限跨越

——中国阿里《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

报告文学

极限跨越

——中国阿里《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

党益民

极限跨越

——中国阿里《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

党益民 郭海涌*

巍巍昆仑，西藏阿里，通天的新藏公路……

武警交通部队受命挺进阿里无人区，创下了武警部队建制团队开进海拔最高、战线最长、环境最恶劣地区的纪录；同时，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2年“五一”前后，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面虚构的故事，在阿里无人区演绎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版本。

* 党益民，1963年生于陕西富平，现在武警交通指挥部任职。著有长篇小说《藏光》、报告文学《川藏线上生死劫》等。郭海涌，1973年生，河北魏县人，现任武警某部新闻站副站长。本文原载《报告文学》2002年第8期

阿里告急：3名战士生命垂危， 请求紧急救援！

2002年4月31日。

首都北京。阳光灿烂，鲜花如海，彩旗如虹，到处呈现出“五一”节欢乐的气氛。走在大街上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时此刻一群年轻的生命正穿行在西藏阿里的无人区，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11时52分，武警交通指挥部总值班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值班员一把抓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我是二总队值班室，有紧急情况报告：开赴新（疆）藏（西藏）公路执行保通任务的八支队，穿越藏北阿里海拔6000多米的无人区时，3名战士由于严重缺氧，突然患肺水肿，生命垂危，急需送下山抢救，请求上级支援！”

接到报告后，武警交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喜来迅速向副政委崔建华作了汇报。崔副政委一边向总部首长请示，一边向正在四川和新疆指导工作的指挥部主任石兆前、政委卢林元汇报了情况。

中午12时，武警部队参谋长陈传阔得到报告后马上请示司令员吴双战。吴司令员指示：立即与总参联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士兵的生命！

陈参谋长让参谋人员打开军用地图，迅速找到了病危士兵所在地——阿里狮泉河。

狮泉河距西藏拉萨1000余公里，距乌鲁木齐2000多公

里，如果用汽车运送，最快也得四五天。陈参谋长果断地说：“用直升飞机！”话音未落，他已抓起了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接总参作战部……”

13时50分，一个不幸的消息从阿里高原传来，3名病危战士中的士官黄帅，抢救无效，已于13时30分牺牲，另两名战士毛玲宝、徐明升病情继续恶化。

14时正，吴司令员在电话中代表武警部队党委、首长和机关，向不幸以身殉职的黄帅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在新藏公路执行任务的八支队全体官兵和病中的两名战士表示慰问。并作了三点指示：（1）总部已向总参请求直升飞机支援，现正在等待答复。（2）总部已与新疆军区联系，请他们作好起飞准备。你们也要通知地面部队，做好接应准备。（3）你们也要主动与新疆军区联系，注意掌握情况，全程跟踪，有情况及时上报。

徐永清政委指示要全力以赴抢救战士的生命，有困难及时向总参求援。交通指挥部主任石兆前和政委卢林元也要求指挥部机关要把此事作为头等大事，全力协调组织抢救，确保两位战士的生命安全。

这一天，武警交通指挥部值班日记上还有这样的记录：

16：00 总部装备部叶部长电话：总参已正式向兰州军区下达准飞命令。派两架“黑鹰”，每架准乘4人。你们要与新疆军区陆航处、阿里军分区保持联系。

17：15 二总队侯总队长报告：新疆军区已下

达下午 6 时起飞命令。阿里军分区支援两名医生。

18:50 总部作战室阎参谋传达刘源中将指示：

1. 对重病战士要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病情恶化，进行抢救。

2. 对牺牲的战士黄帅要做好善后工作。

3. 对全体官兵进行战地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后勤保障工作，极力避免再度伤亡。

22:00 二总队值班室报告：乌鲁木齐正在下大雨，库尔勒机场无夜航能力，且该地区有冰雹，飞机暂时无法起飞……

深夜，总参、武警总部、兰州军区、新疆军区、武警交通指挥部、交通二总队，十几位将军和大校、几十位、几百位加入营救行列的指挥员、战斗员的目光注视着阿里这块世界最高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气候好转，飞机起飞的消息……

“天山深处的大兵”突破生命极地

藏北阿里高原，平均海拔 4500 米，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冈底斯山把这块土地托成了“世界屋脊的屋脊”。

著名的新藏公路就在这众山竞拔的阿里高原上蜿蜒前伸。这条 1957 年通车的公路全长 2269 公里，北起新疆叶城、南至西藏拉孜县查务村。由于该路部分路段为五六十年代国防军事急造公路，因此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环境最复杂、

路况最差的公路。公路穿越数十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达坂（海拔高、冰雪封冻的大山梁）、数百条冰河，被阿里人称为与内地相连的一座“生命桥”。阿里军民所需的国防和生活物质，都要靠这条路运送。夏季沿线驻军每 10 至 15 天送一次给养，冬季封山，靠储备供给，生活十分艰苦，因高原病、突发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人员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公路沿线除日土、普兰等县城有少数居民外，沿线广袤区域杳无人迹。

条件恶劣的新藏公路冬季积雪，冰坎成灾；夏秋季洪水、泥石流泛滥，粉土、塌方频繁，全年不足 5 个月的通车时间中也经常遇到交通瘫痪。40 多年来，新藏公路的状况严重影响着阿里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着西北边陲的国防稳固。

为彻底改变新藏公路的交通状况，2001 年 10 月 22 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把新藏公路养护保通任务交给了武警交通部队。

2002 年 4 月底，武警交通部队二总队八支队挺进阿里高原，承担起新藏公路养护保障通行任务。

人们可能不熟悉武警交通部队，但提起作家李斌奎的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和电影《天山行》，不少人会想起那些无坚不摧的筑路兵——他们就是武警交通部队的前身。现在，这些当年打通了天山南北通道的勇士们又回到了高原。他们开进阿里无人区，再次挑战生命极限，维护生命之路。

在大部队进藏前，2000 年 5 月，武警交通指挥部主任少将石兆前带领 17 人勘察组率先走上了阿里高原。据沿线兵站的官兵讲，石兆前少将是我军惟一一位走上界山达坂的将军。

勘察组历时 22 天，他们穿戈壁、越雪山、过沼泽，克服高原缺氧、道路险恶、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行程 4500 多公里，途经两个自治区、8 个县、16 个乡镇，9 个湖泊、21 条河流，翻越了 8 个达坂，收集和拍摄了新藏公路接养路段沿线的路况、主要病害、社情、民情等文字和影像资料，为部队进驻接养奠定了基础。

界山达坂是全线最高的地段，海拔 6700 米。跟随将军一起走过新藏公路全程的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刘军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跋涉。路上他的腰几乎被颠断，头疼得厉害，有好几次他都感觉挺不住了。尽管石将军一路上脸色黑紫黑紫的，很难看，连嘴唇也变得乌黑，但他情绪乐观，始终没有说一个苦字。刘军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他们赶了 17 个小时的路程，途中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吃一口饭，简直就像到了外星球。

一年后，当大部队在开进阿里的路上遇到困难时，干部们这样鼓励战士：将军都上去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上不去？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前进！

士兵黄帅牺牲时，石兆前少将正在西藏川藏公路上检查部队工作，得到消息后，铁骨铮铮的将军流泪了。跟随将军的毛广程秘书讲，为了黄帅，将军流过三次泪。

2001 年 11 月 17 日，先遣组抵达阿里。他们的任务是为大部队开进选线定点，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12 月 10 日，先遣组从阿里赶往普兰的途中，打头的尼桑车陷入冰河里。这里前后几百里荒无人烟，只能靠自己将车推出冰河。先遣组长、八支队副支队长张积军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其他

人跟着跳……车子被推了出来，但他们却怎么也上不了车，因为他们的裤子早已冻成了厚厚的冰桶，无法将腿抬起来……

大部队进军阿里前夕，武警交通指挥部党委专门指派常委、总工程师朱德保，带领前线指挥组抵达拉萨，沿新藏公路反方向提前进入阿里狮泉河，在那里迎接大部队。朱总4月13日从拉萨出发，昼夜兼程，16日抵达指挥地点。这位在新疆干了30多年、修筑过著名的天山公路的老兵，调到北京不到一年，又重新回到了高原。

部队正式出发前，在叶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武警交通指挥部政委卢林元少将亲自作战前动员后，下令部队挺进阿里高原。

勇闯冰达坂，跨越死人沟

4月16日，大部队从新藏公路零公里所在地叶城分两批向阿里无人区进发。

这是一个让阿里高原和新藏公路震惊的壮举——漫长的行军路途，长长的车队载着上百吨军用物资、生产物资以及各种装备，浩浩荡荡，去穿越数百里无人区，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达坂，闯过21道冰河险滩。官兵们高亢的歌声回响在高原，整齐有序地向喀喇昆仑腹地挺进。

第一批部队历时6天，行程1400多公里，于22日到达目的地普兰县。第二批4月25日出发，历时8天，行程2000多公里，于5月2日到达指定地点萨嘎县。

走进阿里无人区，要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阿卡子达坂。汽

车沿着陡峭的山道，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行驶着。因为海拔高，水箱里的水七八十度就开了锅。车上的人只觉得呼吸短促，五脏六腑像被搅成了一锅粥。车队爬上达坂后，海拔已经上升到4800米。达坂上皑皑白雪发出耀眼的光芒。积雪在车轮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跟随部队挺进的八支队干事辛志伟后来向我们描述说：站在达坂顶上，才感到人的渺小。昆仑山巍巍峨峨，公路蛇一样逶迤在山间，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说，从阿卡子开始，许多官兵就开始出现胸闷、头疼、恶心、呕吐等高原反应。但谁心里都清楚，艰难的里程这才刚刚开始。

过了阿卡子、库地达坂，是海拔5080米的麻扎达坂。“麻扎”，维语的意思是坟墓。这里的公路是在山岩上硬凿出来的，头上是岩顶，脚下是深渊，绵延30里险路上随处可见滚下悬崖的汽车残骸，这些残骸遗留在万丈谷底，铁锈被风雪冲刷后，在岩石上形成赭红色的痕迹，像一道道凝固的血，向人们诉说着那些不幸的遭遇。

车队像是在老虎嘴里爬行，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滚下万丈深渊。官兵们感到呼吸困难，基本上无人说话了。

连绵的大山上杳无人影，一整天中，除了偶尔看见一两只野骆驼和野驴从眼前跑过，再也看不到一点鲜活的生命。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得使人睁不开眼，白云如棉絮般就在官兵头顶漂浮。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

4月17日，车队开始翻越海拔5200米的第三座达坂：黑卡孜。许多官兵头晕目眩，吃不进干粮，有些人开始呕吐酸水。出发前，所有官兵都配备了“一棉四皮”：棉袄、大头皮

鞋、皮帽子、皮手套、皮大衣。但此时此刻，刺骨的寒风还是冻得他们簌簌发抖。那天，车队很晚才到红柳滩兵站。

熄灯时间过去很久了，二总队刘传学参谋长和八支队马海卿支队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俩头疼欲裂，将背包带绑在头上也无济于事。自己都这样，其他官兵呢？他们来到官兵们的床前，用手电一个个照过去，果然战士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入睡，高原缺氧折磨得他们鼻涕、眼泪和口水交织在一起，还有的正趴在那里哇哇地吐黄水。

这样消耗下去，即便熬到天亮大家也睡不着，还可能拖垮部队，削弱士气，刘传学与马海卿商量着：“与其在这里受罪，还不如早早离开这里。”于是，他俩果断命令：凌晨4点半起床，5点吃饭，吃过饭出发！

部队开始翻越界山达坂。界山达坂是全线海拔最高的路段，也是西藏和新疆的分界线。这里空气含氧量还不到平原的40%，道路多为盐碱地，夏季翻浆严重。走过这段路的司机都知道，车辆一旦陷进翻浆的路面，司机要么弃车，要么丢命。

部队到达界山达坂时，狂风、暴雨、寒冷、缺氧一起向官兵袭来。有的战士晕倒了，有的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新兵郭晓力只有17岁，高山反应十分严重，手脚发麻，头晕恶心，他实在忍不住了，哭着对班长说：“我好难受，我想我妈。”为了不引起其他战友的条件反射，他几次强忍着恶心把涌到喉咙口的东西咽了下去……

4个小时后，官兵们还是将界山达坂甩在了身后。

部队翻过了界山达坂，支队长马海卿无比自豪地说：“这

样一支过硬的队伍，这样一群坚强的官兵，别说是界山达坂，就是珠穆朗玛峰我们也能将它踩在脚下。”

车队在风雪茫茫的高原上继续向阿里深处进军。中午，车队来到“死人沟”。

长达几十公里的“死人沟”，地处喀喇昆仑腹地，距界山达坂约 100 公里。历年在这里冻死、病死以及翻车死亡者留下的累累白骨数不胜数。车过这里，凄厉的风声犹似鬼哭狼嚎；夜幕降临，沟两旁星星点点的磷火连成一片，使人毛骨悚然。

部队到达“死人沟”时，寒风怒号，大雪飘飞。有着丰富高原工作经验的马海卿下令炊事班就地埋锅造饭，部队在通过“死人沟”前稍事休整。队伍休整后，官兵们高唱战歌鼓舞斗志，开始征服“死人沟”。

“死人沟”名不虚传，进沟不久，官兵们就出现嘴唇青紫，面色浮肿的状态，他们张大嘴喘着粗气，一个个被高原反应折磨得不成人形。

新兵徐明新反应严重，头疼得栽倒在地，连站也站不起来了。随队医生刘盛自己鼻子流血不止，他扯一团棉花把鼻孔一塞，又忙着为小刘等官兵治病。积雪太厚，汽车不断出现打滑，副支队长邢秀银等人只得将大衣垫在车轮底下，才使车子顺利通过危险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长长的车队终于走出了“死人沟”。

4 月 29 日，第二批车队收尾的“救护车”经过“死人沟”时，天已经黑了，车上一名患病的战士下车方便。谁知

刚一下车就招来了一群野狼。情急之中，副中队长往自己的大衣上浇了汽油，点燃了扔过去驱赶狼群，才救出了小战士。

当地有句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到多玛。”这段路程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指挥组成员后勤处长赵建平后来回忆第二批车队从红柳滩到多玛时说：那天的暴风雪特别大，白茫茫一片，路也看不见，车队只有凭感觉往前走。前面的车刚过，车印就被大雪覆盖了，紧跟在后面的车就找不到路了。虽然只有一段 200 多公里的路程，但车队连续一整天走在海拔 5500 多米高的地方，高原反应特别大。车队从早上 4 点出发，直到晚上 11 点，最后一辆车才赶到多玛。

翻过了多玛，总指挥朱德保大校挺立在风雪中迎接车队。朱总是进军队伍里职务最高的副军职老兵。他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地与每一位战士握手。战士们看见年过半百的朱总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雪中，所有的人都穿着皮大衣，惟有他一人没有穿大农，战士们深受感动，战胜高原的信心倍增。

那天晚上，赵建平问朱总：“你不穿大衣，不冷吗？”朱总说：“冷啊，我都快要冻僵了。可是为了鼓舞士气，我必须这样做！”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二战时美国名将巴顿将军的故事：一次部队进军中，巴顿看见一台坦克陷在泥滩里出了故障，一向爱干净的巴顿二话没说，戴着雪白的手套钻进坦克底下的污泥里。几分钟后，他从坦克下面爬了出来，一身污泥。手下的军官问他：“修好了？”他说：“我根本就不会修什么见鬼的坦克。”军官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巴顿说：“修好坦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我的士兵知道，我巴顿趴

在污泥里修过坦克。”巴顿的办法果然见效，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加快……

十几双眼睛注视一个苹果， 谁也不愿咬第一口

越是危难时刻，越能体现战友情，同志爱。

部队进军途中，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干部就是一个标杆。党员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出官兵互敬互爱的感人故事。

一路上，干部坚持不吸氧，把有限的氧气留给战士；每到一个兵站，干部、骨干主动为新战士铺被褥，打洗脸水；开饭时先让战士吃，饭菜不够时干部骨干喝矿泉水啃干粮。气候恶劣，路况极差，党员干部都主动要求坐在颠簸厉害的车尾，为战士们遮风挡灰。二中队中队长陈武春就一直坐车厢的最后面。随着海拔逐渐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为了让战士们呼吸新鲜空气，他打开身后的篷布，让空气能够流通，用自己的脊梁为士兵抵挡着喀喇昆仑凛冽的“刀子风”。一路风尘把他变成了一尊“兵马俑”，一连数日他坚持不让战士们替换这个最危险的位置。后来，他终于支持不住了，趴在后挡板上吐了半个多小时。卫生员将车上仅剩的一支葡萄糖拿来，催促他赶快喝下去。他刚要喝时，发现战士刘晓宇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又将葡萄糖递给刘晓宇。望着吐得满脸眼泪鼻涕的中队长，小刘坚决不喝，可陈武春说：“这是命令，喝！”小刘只得含泪喝下……

炊事班长刘建军翻越界山达坂昏倒了，随队医生将他运送到救护车上全力抢救。这时的救护车上已经躺满了病号，刘建军刚苏醒过来，新战士徐明新又被战友们扶过来，刘建军便拔掉氧气管，挣扎着从车上爬下来说：“我没事，他比我更需要治疗。”

在高原，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中水分就减少10%。在几百公里无人区，早上装得满满的一壶水，到中午就滴水不剩了。

二中队的16名官兵坐在一个大篷车内个个嘴唇干裂，嗓子里火烧一般生痛。车上已经没有一滴水了。上等兵陈浩嘴唇裂开了口子，一动就流血。陈浩的口袋里装着一个苹果，几天来一直没有舍得吃，想等到最艰难的时刻再吃。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便掏出苹果。战友的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他手中的苹果，但旋即又转向了别处，或闭上眼睛装睡。陈浩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苹果，然后轻轻拉了一下旁边的新战士兰向亮，将苹果放进小兰的手里。小兰摇头，陈浩示意他一定要吃。小兰犹豫了半天，十分为难的样子，后来轻轻咬了一小口，又将苹果传到了下一个人手中……

就这样，一个苹果在16个人手中转来转去。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上甘岭》。巧的是，这个车厢里就有刚从曾经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七支队调过来的5名战士。

支队政治处主任李峡，一谈起部队进藏时官兵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忍不住要落泪。他说：“我积攒了一生的泪水，这回全部洒在了阿里高原了。”

4月19日，部队翻越界山达坂，二中队三班长谭小宁因

剧烈的高山反应而休克，李峡听说后，顾不得高原不能剧烈运动的告诫，跑步直奔二中队大篷车。由于跑得太急，大脑供氧不足，一下子栽倒在离车不远的地方。李峡苏醒后，顾不得自己鼻青脸肿，赶快组织医生对谭小宁进行抢救，终于把小谭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李峡和支队长马海卿商量，决定送小谭回叶城治疗。听到这一消息，小宁拉着李峡的衣服喊：“我不回去！我刚上来！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面对这么坚强的战士，李峡的泪水夺眶而出……

摄影师的眼角突然爬上鱼尾纹， 女兵上厕所成了大问题……

二总队宣传处长杜彦林和指挥部摄影干事陈邦贤，是第一批车队里年龄较大的两个“老高原”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随队拍摄录像和图片资料。他们扛着摄像机，跑前跑后，成了行军队伍里独特的风景。

陈邦贤接受采访时说，无人区有一段路相当难走，主要是不知道往哪儿走，看起来哪儿都像是路，可走起来哪儿又都不是。其实，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路。走进无人区，脚在哪里路就在哪里，只能凭感觉。他说，有一天真邪门，他们走了不到两公里，就爆了4次轮胎。路上杜彦林高原反应很重，忍不住头疼，他为自己准备的止痛片都让杜彦林吃光了。走到最高处，车上战士们都晕晕乎乎的，看起来像犯困，其实那是半昏迷状态。带队的干部命令战士不准打瞌睡，怕他们一旦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但还是有人歪头睡着了。后

来，战士们为了强打起精神，就相互打耳光……

陈邦贤印象最深的是阿里的紫外线。他讲了一个小细节：一天，他奇怪地发现杜彦林的左眼角突然有了一道道白色的“鱼尾纹”。早上起来还好好的，怎么到了下午就有了鱼尾纹？更为奇怪的是，左眼角有，右眼角没有。他告诉老杜，老杜急忙走到倒车镜前一照，果然是，用手一摸，却并没有沟痕。老杜有些紧张，急忙用水去洗，却怎么也洗不掉。后来他们才弄明白，原来是高原紫外线搞的鬼。老杜摄像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闭着的左眼，眼角褶皱里的皮肤躲过了紫外线的照射，所以是白的，而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却被紫外线晒黑了，这样就有了“鱼尾纹”。

问起这事，杜彦林说：鱼尾纹没啥，要命的是上厕所。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阿里高原行军，途中不敢轻易停车，尤其是山顶，车子一停下来就很难发动起来；人在车厢里坐得时间久了，突然一下车更容易晕倒，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车队在路上很少停下来，尽量往前赶路，只有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才停一会儿，让大家方便方便。但一路往上，海拔越来越高，停车的时候自然就越来越少了，上厕所就成了问题。我看见有的战士实在憋不住了，就尿进空的矿泉水瓶子里。我看这倒是个好办法，也想这么干。可自己是个老兵，不好意思。后来实在憋不住了，还是那么干了。

杜彦林说：我们这些男兵还好办，女兵可就麻烦了。车队一停下来，多半是为了让女兵方便。带队的干部说，以车为界，男左女右，方便方便。男兵跑到左边，稀里哗啦就解决了问题。女兵却要跑出很远很远，平展展的戈壁滩，她们

很难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她们走啊走，终于消失在一道坡坎后面。过了一会儿不见女兵回来，带队干部有些担心，怕她们晕倒在那里，但又不能派人去看，等女兵回到车边，一个个脸变成了茄子色，几乎晕倒。后来，带队干部再也不让她们走远了，遇到她们想方便的时候，命令男兵不准下车，一律向前看，让女兵们在车后面解决问题。

就这样，最“危险”的地方，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爱唱歌的女兵， 走着走着，她们就唱不出来了

八支队政治处干事杨景在部队出发前，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带四个女兵一起上阿里。他成了“护花使者”。

部队出发前，主任带着四个女兵找到杨景说：“她们四个就交给你了，让她们配合你做些鼓动宣传工作。你要好好照顾她们，出了问题拿你是问。”主任说完就匆匆走了。杨景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差事，但这是命令，只好执行。

宣传车上除了司机，就是杨景和四个女兵：上等兵班长潘俊红、列兵董芳芳、郁静静、夏诗仙。女兵真是麻烦，一上路就叽叽喳喳的，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好像不是去阿里，而是去逛服装市场。更要命的是，她们还唱歌。她们唱了许多歌，但我只记住了一首《军中绿花》。

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站岗执勤
保卫国家，风风雨雨也不怕……

头两天平安无事，女兵们精神很好，在宣传车上帮着广播行军中感人事迹和一些鼓舞士气的豪言壮语。她们白净鲜嫩的皮肤在昆仑山的狂风下已变得黑红粗糙，嗓子也因连续播音变得干燥沙哑。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她们的情绪，她们反而觉得很浪漫，很刺激，说有了这次经历，一辈子都值得骄傲。她们说得对，她们值得骄傲。现在都市里的女孩，有谁能走上阿里高原。别说都市里的女孩，就是部队里的女兵也很少有人走进阿里无人区的。

第三天，车到达红柳滩兵站，刚住下，郁静静、夏诗仙一脸惊慌地跑来找杨景，说潘俊红不行了，吐得厉害。只见潘俊红脸色苍白地趴在床边正在吃力地呕吐，地上的脸盆里面有不少浊物。医生来了又是给她打针又是吃药的，折腾了三四个小时，小潘才缓过劲来。可是第二天早上刚一上路，小潘又开始呕吐，呼吸困难，杨景知道这是高原反应，赶快拿出氧气袋让她吸氧。董芳芳也开始头疼，看着潘俊红有气无力的样子，一下子就哭了，问杨景：“排长，我们会不会死？”

杨景极力保持镇静，安慰她们说：“第一次上高原谁都会有反应，你越怕反应就越大，你要是不怕了，反应就会小多了。”他嘴上这么说，可心里也害怕，四个女兵都还小，最大的也才20岁，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好在女兵们最初的反应到了中午就过去了，杨景长长地嘘了口气。但还是有些担心，因为前面的路更艰难，山更高。不过，从那天开始，女兵们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了。

郁静静是新疆人，家里就她这么一颗“掌上明珠”，参军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在行军途中，她

却表现出了超人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4月20日，部队行至班公湖时，郁静静高原反应突然加重，呕吐不止，神志不清。杨景刚把她扶下车，她就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冷汗顺着两颊直流。随行的医生就地对她进行紧急抢救。苏醒过来的小郁第一眼看见了面前的班公湖，对守护在身边的潘俊红说：“班长，你看班公湖多美！她多像我们家门前的赛里木湖啊。”她又扭头对杨景说：“排长，我没事，你看我都能走了。”她站起来，刚走了两步，又晕倒了……

政治处主任李峡路上也遇上了几个女兵，看着这些昔日活泼可爱、皮肤嫩白的小女兵，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粗硬的山风折磨得皮肤粗糙、嘴唇青紫的样子，泪水不禁涌了上来：“你们辛苦了。”女兵也掉泪了，但她们很快就安慰自己的首长：“首长，我们不苦，我们不哭，我们一定能走到目的地！”

20日晚，部队到达狮泉河，地方政府领导和藏族群众排着长队，捧着哈达和青稞酒迎接我们。阿里地区行署董专员看到队伍里还有女兵，感到很惊讶，走上前亲切慰问她们，敬佩地说：“女兵能上来，真不简单啊！”

沿着父亲的足迹， 黄帅完成了极地的生命跨越

黄帅，一个普通士兵。

黄帅的父亲也曾是一个士兵。25年前，他就在儿子现在的部队里服役，在天山打了8年的公路隧道，然后复员回了

老家。25年后，黄帅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上了昆仑山，走进了阿里无人区。可是他刚上去，就永远地倒在了阿里高原。当父亲重上高原去看望儿子时，儿子已化成了叶城烈士陵园里的一块墓碑。

黄帅的部队原本不在新疆，而在海滨城市大连。那里的海拔为零。

2001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二总队准备改编一支部队上阿里高原，执行新藏公路养护保通任务。这一消息传到大连后，黄帅立刻跑到中队部要求到阿里去。在黄帅的坚决要求下，他如愿以偿，被调入八支队一中队，在汽车班担任汽车驾驶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汽车班班长。

年底，部队安排黄帅回家探亲。探亲期间，25岁的黄帅与相恋多年的未婚妻姚云办了婚事。家里人知道他要上阿里，十分担心，妻子姚云更是放心不下。每当妻子问起阿里时，黄帅都说：“那里很美，有草，有花，有羊，跟仙境一样。”其实，黄帅心里非常清楚阿里意味着什么。为了上阿里，部队提前半年就开始高原适应性训练了。

归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黄帅临走的那天夜里。妻子姚云说：“听人说阿里很苦，高原反应很大，会有生命危险，你能不能不去？”黄帅说：“我是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姚云说：“咱们刚刚结婚，你能不能为了我请个假？”黄帅把妻子搂在怀里，笑着反问道：“你愿意你的丈夫当一个临阵脱逃的懦夫吗？”“可是，我怕……”姚云话还没有说完，泪水就涌了出来。黄帅抹掉妻子脸上的眼泪，说：“你看看你，我快要

走了，你这么眼泪汪汪的，叫我怎么放心得下。答应我，不哭，好吗？”姚云一边点着头，一边还是不停地用手抹着怎么也止不住的泪水。

第二天一大清早，黄帅来到父母屋里向老人告别，哪知年迈的父母早就起来了，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给儿子送行。母亲拉过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上高原千万注意安全。黄帅笑着安慰妈妈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出门，你们就放心吧！”一向严厉的父亲这时也走过来，神情肃然、目光慈祥地说：“阿里可不比大连，那儿海拔很高，大部分地方根本就是无人区，你还是要当心才是，尤其注意不能感冒。”黄帅说：“您放心吧，我会注意的。”然而，一个月后，黄帅的不幸，恰恰就因为染上了父亲强调不能患的“感冒”。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姚云顾不得黄帅的父母都在面前，情不自禁地紧紧抱着新婚的丈夫，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黄帅眼里也噙满了泪水，他抚摸着妻子的头发小声地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别这样，免得咱爹妈更担心……”姚云恋恋不舍地目送丈夫登上西去的列车……

这是姚云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丈夫。要是她当时知道这就是他们夫妻的永别，她说什么也不会放丈夫走的。

4月25日，黄帅跟随第二梯队驾车上山。车行至库地兵站时，他就出现了恶心、胸闷、头疼等高原反应，他吃了几片卫生队配发的药品，继续赶路。到了红柳滩，黄帅的高山反应更强烈了，但他怕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没有把病情告诉任何人。晚上，战友们发现他吃不下饭，连清水都喝不下，便向中队报告了这一情况。随队军医陈鹏立即给他进行诊断，

及时给他吸氧、输液、服药。第二天早上，病情刚刚好转的他，又坚持回到了自己的驾驶室。

从红柳滩兵站到多玛兵站，行程虽然只有 360 多公里，但至少得走十几个小时。早上从红柳滩兵站出发时，天气还挺好的，哪知一爬上海拔 6700 米的界山达坂，就遇上了漫天大雪。转眼间，大雪就把道路掩埋了。天地白茫茫一片，气温降到零下 20 多度。此刻，所有官兵都出现了剧烈的头疼、恶心、呕吐等高山反应，不少战士只好用背包带紧紧勒住头部，以减轻头疼欲裂的痛苦。黄帅高原反应更重，但他强忍着继续赶路。

晚上，部队到达多玛兵站。吃完饭后，随行军医为每个战士例行检查身体，发现黄帅和另外两名战士毛玲宝、徐明新有发烧症状，赶快为他们治疗。第二天，黄帅和那两名战士的病情加重，尤其是黄帅，他呼吸急促，面色青紫，说一句话都得喘上好一会儿。支队政委邹聪知道情况紧急，他一边让军医救治，一边向指挥行军的交通指挥部总工程师朱德保汇报。朱总当即决定：速派专车送 3 名战士到阿里军分区医院治疗，并电告指挥部，请求飞机支援。

3 名战士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黄帅病情危急，肺部已出现水肿。

连眼睛都睁不开的黄帅喘息着说：“先抢救新兵。我没事，我能挺得住……”

4 月 30 日中午 1 时 30 分，黄帅经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博大的阿里，接纳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朱总得到黄帅牺牲的消息，泪

流满面，悲痛地打电话向指挥部石兆前主任和卢林元政委作了汇报：“我没有保护好战士，我有责任，我向党委检讨……”

黄帅的遗体被安葬在新藏公路的起点——南疆叶城烈士陵园。

一个星期后，黄帅的父母从江苏淮安匆匆赶来。站在儿子的墓前，母亲悲痛欲绝，父亲却显得比较坚强。这个在高原修了8年天山公路的老兵，早就知道当兵意味着什么，高原意味着什么。

他们的身后，是黄帅年轻的妻子姚云。

姚云是幸福的，新婚蜜月刚过，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姚云又是不幸的，结婚不满3个月，她就永远失去了丈夫。这大喜大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踵向她袭来，让她一个女人怎能承受得起。

姚云跪倒在黄帅的墓前失声痛哭：“黄帅，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啊……”她有一肚子话想对丈夫说，然而，丈夫再也不能回答她了。

昆仑山脚下呜咽的风声伴着姚云撕心裂肺的恸哭，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这次来部队为丈夫送行前，曾有人劝她说，你还很年轻，今后拖着个没爹的孩子，麻烦。还是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吧！姚云没有理会这些好心的劝说，不顾强烈的妊娠反应，陪着黄帅的父母来到了青藏高原。她怎能不来看看她的黄帅呢？他是自己心爱的丈夫呀！哪怕结婚只有一天，他也是她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姚云是那样地爱他、想他。

姚云说：“黄帅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我不能让他们再失去一个。我非常爱黄帅，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等孩子长大了，我会给他看他爸爸的照片，我会带着他再来青藏高原……”

“黑鹰”紧急降落狮泉河； 医疗队直扑阿里

黄帅走了。另两名战士毛玲宝、徐明新的生命危在旦夕。

“战士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4月30日17时，新疆军区接到总参和兰州军区的命令后，立即研究飞机营救方案，准备18时起飞。

某陆航团参谋长、特级飞行员沈正文和飞行大队副教导员在短时间内做好了一切起飞准备工作，并在驻疆空军飞行管制中心、民航乌鲁木齐指挥中心等军地单位的配合下，开通了“空中应急通道”。武警交通二总队同时制定了应急抢救预案。南疆12医院和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分别作好了救治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起飞命令。

然而就在这时，乌鲁木齐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飞机一时无法起飞。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多少人在仰望夜空，焦急地等待着雨过天晴。北京的将军们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前方的消息。

5月1日9时36分，两架黑鹰直升机终于起飞了，从北疆飞往南疆重镇喀什，然后又从喀什直飞阿里高原。13时30分，两架黑鹰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阿里狮泉河镇郊外的简易

停机坪上。交通八支队政委邹聪已看护着两名重病战士守候在那里。见到飞机降临，官兵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两名战士被迅速抬上直升机，机组人员连一杯水都没有喝，又迅速向喀什飞去。

阿里至喀什，空中距离 1200 公里，必须经过海拔 6700 米的界山达坂和空喀山口。途中，直升机多次遇到强烈的高原气流，一次次出现颠簸，一股股冷风顺着机舱门的缝隙直往已是零下 10 多度的机舱里钻。为防止重病战士冻伤，机械师王光涛和潘睿分坐在机舱门边，用身体挡住寒流的侵袭。随行的交通二总队女军医冯宁在飞机的颠簸下出现了晕机现象，脸色发青，胃部痉挛，但为了战友不受颠簸，她始终将战士徐明新紧紧抱在怀里；50 多岁的交通二总队门诊部主任左家宽跪在毛玲宝身边，喂水、抢救，额头上渗出了汗水。

当飞机飞临昆仑山口时，前方突然出现一团团浓厚的乌云。沈正文冷静地驾机在云层中盘旋，捕捉可能出现的云层间隙。一圈、两圈，当飞机盘旋到第三圈时，一道阳光从云层和山口之间透了过来。这一线阳光立刻让沈正文眼睛一亮，他和副驾驶刘俊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果断地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向云层中穿越而去，飞过了昆仑山口。

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艰苦航程，当天 19 时 48 分，两架“黑鹰”直升机安全降落在喀什。

此刻，在喀什机场，解放军南疆军区、解放军新疆军区 12 医院、武警新疆总队南疆指挥所、武警交通七支队等单位官兵及医务人员和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开道车翘首以待。飞机降落后，两名重病战士立即被安全送到 12 医院，在医院专

家的全力抢救下，当晚8时44分，两名垂危的战士脱离了生命危险……

5月4日凌晨2时，又一个紧急的消息从阿里高原腹地的萨嘎县传来：八支队六中队士官高国庆因感冒和缺氧引发肺水肿，因萨嘎医疗条件有限，请求上级紧急支援。

5月5日凌晨1时30分，八支队又有一名战士王新健病倒了……

接到求救电话，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立即披衣起床，指示部队全力救援。前方部队报告：萨嘎条件艰苦、交通不畅，如果把患病战士送至狮泉河治疗要走980多公里，送往日喀则要走460多公里。

司令员心情十分沉重。他连夜召集有关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救援方案，命令武警西藏总队立即组织医疗队，火速奔赴萨嘎县救援。同时他命令部队沿新藏公路展开3个月的医疗大巡诊。

接到总部命令后，西藏总队6名医生乘坐装满大量药品和救援设备的救护车紧急出发……

医疗队日夜兼程900公里，于5日15时赶到了萨嘎县。3个多小时后，徘徊在死亡线上的高国庆和王新健被抢救了回来。紧接着医疗队又赶赴五中队抢救了另外一名患心脏病的战士肖坤健。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这3名战士被连夜送往拉萨西藏总队医院治疗。随后，医疗队沿新藏公路对沿线部队展开了巡回医疗……

5月10日，阿里来电说，所有重病的战士已经全部脱离

危险，其他官兵也渐渐适应了高原气候，部队安营扎寨，短期休整后，投入新藏公路维护，完成保通任务……